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正确政绩观蕴含的价值导向与科学方法

曾峻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结合的角度把握

其重大意义，着力从党性高度揭示政绩观偏差的根本原因，全面把握正确政绩

观蕴含的价值导向与科学方法，不断完善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保障条件。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党的性质宗旨看，政绩观问题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息息相关。作为“人民的党”“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政绩观与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优良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政绩观要从党的使命任务出发，关键看“四个有没有”，即“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从党的奋斗历程来看，政绩观问题关系到事业成败与干部形象。我们党始终高度关注政绩观问题。毛泽东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彰显了敢于斗争、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邓小平强调“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政绩”一词进入了党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任职期间认真学习、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生动的实践范例。从党的时代任务来看，政绩观问题关系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所面临的环境形势、目标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显得尤为紧迫且重要。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明确提出相应要求。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时纠正政绩观扭曲和偏差行为，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巩固执政基础，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贪污腐败、作风不正、搞特权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一个‘私’字”作怪，私心压倒了公心，私人利益压倒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私心杂念作祟必然导致政绩观扭曲变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那些见风使舵、处事圆滑

的人，那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人，那些花拳绣腿、不干实事的人，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人，都有私心杂念在作祟。不担当、不作为同样是错误的政绩观。“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一些党员干部不愿作为，觉得费心费力却吃力不讨好，或者认为组织“亏待”了自己，于是选择“躺平”“摆烂”。一些党员干部不敢作为，害怕得罪人、害怕被恶意指报，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做事。这些

都是从自身得失去考虑问题，而非从工作和事业的角度出发，偏离了党性原则。因此，既要纠正乱用滥用权力的乱作为问题，也要纠正不用不用权力的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私心杂念。唯有摒弃私心杂念，方能讲真话、察真情、报真数，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进而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且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正确政绩观的衡量标准和实践要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涉及若干重要关系。一是上与下的关系。要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尤其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打折扣、不做表面文章。紧密结合地方、单位及部门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反对照搬照抄，杜绝“大水漫灌”，切忌生搬硬套、上下一般粗。二是前与后的关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轻易否定原来的工作，不急于“烧三把火”。要依据上级的新要求和群众的新期盼，针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采用新思路、新举措推动工作。三是左与右的关系。积极学习借鉴有益做法和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错位发展，切忌千人一面、左右一个样。四是近与远的关系。针对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感，但不

能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不能留下隐患，不能“空前绝后”、竭泽而渔。对于事关长远、一时难以见效的事情，还要进行前瞻性谋划并及时推进。五是质与量的关系。自觉追求有质量的数量、有效益的速度。正确看待各种排行榜和排名，不被片面甚至错误的舆论所绑架。六是点与面的关系。抓住主责主业和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避免“散光”、平均用力，强化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实现各方面工作的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七是破与立的关系。坚持开拓创新，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也要注意先立后破、破中有立、以立促破。八是大与小的关系。善于“抓大”，但也不能“放小”，对于重要任务“一把手”要亲自部署、关键环节要亲自把关、落实情况要亲自督查，不

能只挂帅不出征。九是经与权的关系。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在体现战略意图的前提下，保持战术、策略的灵活性。十是奇与正的关系。坚持大原则、大方向不动摇，反对哗众取宠式的“伪创新”，也要反“套路”，善于出奇制胜，推出有创意、有创见的思路和举措。正确政绩观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辩证对待干事创业过程中的各种关系，要尊重规律、尊重实际、尊重群众需求。不同领域有自身的规律，不同地区和单位、不同时期的情况各不相同，群众需求千差万别，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具体情况搞清摸透，凡事因地制宜，千万不能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保障条件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离不开必要的制度支撑。不断改进考核评价体系，用好政绩“指挥棒”。坚决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现象，决不能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不干比干更得利”的导向。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把敢不敢干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

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依据，让不作为的人“坐”不稳，让跑官要官的人没市场，让买官卖官的人受严惩。全面、客观评价干部的综合表现，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坚持按规矩办事，提升制度的约束效力。坚持依规决策、按规则办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通过汇聚众人智慧，弥补个人认知的不足，避免决策失

误；通过公开的集体研讨，防范项目、资金、干部任用等方面的违规操作；通过集体决策，达到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的目标，为高效执行奠定良好基础。贯彻民主集中制，“一把手”起着关键作用。“一把手”唯有做到公道正派、事业心强、作风优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以正确的方式创造高质量发展业绩，才能团结带领班子成员以及其他方面的同志共同创造不负人民、无愧时代的新业绩。（转载自《学习时报》）

新论

读一点“无用”之书

□樊尚仁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阅读，于个人而言，是自我提升、丰富精神世界的有效途径；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更是推动进步、传承文化、凝聚力量的重要基石。因此，读书绝非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我们应当终身践行的大事。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书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学生时代，为了应对各种考试，自然要读大量与学业相关的书籍，汲取知识，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工作后，为了满足工作需要，提升专业技能，又要专注于与工作紧密相连的书籍，不断适应职场の変化与挑战。然而，在专注于这些“有用之学”的同时，今天，我更想强调的是，我们要读一点“无用”之书。

“无用之学”的困境与误解

在过度追求“有用之学”的人眼里，以哲学为代表的“无用之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并遭到部分人的忽视。很多人对“无用之学”存在误解，认为它们不能直接带来实际的利益，如物质财富的增加、职位的晋升等，因此，在阅读选择上往往对其避而远之。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片面且短视的，“无用之学”往往比“有用之学”更加有用。

历史早已给出警示：古希腊城邦时期，哲学家们仰望星空思考“存在之谜”时，被讥讽为“不事生产的闲人”，然而，正是这些“无用”的追问，奠定了西方文明的逻辑根基；北宋文人苏轼在贵州贬谪期间研究酿酒、制墨，看似“不务正业”，却在这段“无用”时光中完成了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升华。人类历史上所有突破性发现，从牛顿的苹果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始于对“无用之问”的执着探索。

“无用之学”的重要意义

哲学作为“无用之学”的典范，实则是人类认知的基石与行动的罗盘。人们常说，哲学是世界观、哲学是方法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世界观如同高悬的北极星，为迷途者标定方向——当科学家探索量子世界时，决定其研究路径的是唯物或唯心的本体论选择；当政治家制定政策时，隐含其后的或是功利主义或是义务论的伦理框架。这种认知坐标系一旦偏移，整个思维大厦都将倾斜；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因专注观星坠入水坑，却以“认识宇宙比避免跌倒更重要”的宣言，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提出“心即理”，将儒家伦理转化为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这些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法论则是将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桥梁。孔子“叩其两端”的辩证思维，孕育出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培根归纳法与笛卡尔演绎法的碰撞，催生了现代科学方法论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哲学方法论更显现珍贵：当算法面临“电车难题”的伦理抉择时，唯有借助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后”或边沁的功利计算，才能为机器伦理注入人性温度。这种看似“无用”的思辨，实则是防止技术异化的关键闸门。

哲学之用，恰在于其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没有实用功能，却承载着人类对自由的永恒向往；庄子“无用之大树”的寓言，揭示了超越工具理性的生存智慧。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哲学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如同精神防波堤，帮助我们抵御信息碎片化、快餐式的冲击，在算法推荐构建的“信息茧房”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虽不能直接兑换为物质利益，却是文明传承与创新不可或缺的基因密码。

由此可见，“无用之学”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框架和行动的准则，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始终保持清醒、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

正确看待“有用”与“无用”

《庄子》中的小故事生动展现了“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的差异。惠子与庄子交谈时说，魏王赠他大葫芦种子，结出的葫芦能容纳五石粮食，但用以盛水不够坚固，制成瓢又过于庞大，他觉得无用便将其击碎。庄子回应：“你真不会用‘大’的东西。宋国有个人会制防手皸裂的药，其家世世代代都使用这种药，从事漂洗丝絮的工作而不会皸手。后来，有人用‘百金’买下药方，游说吴王，把这个药用到士兵身上，在冬天的一场水战中打败越国。事后，吴王把一大块土地赏给这个人。同样的药方，有人靠他获封地、荣耀家族，有人只能靠他漂洗丝絮勉强糊口，这是用途不同。你有能装五石粮食的大葫芦，为何不绑在腰间，游泳时靠它浮在水面？就不觉得它大而无用……”

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惠子与庄子看待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惠子过于注重实用性，仅看到大葫芦在常规用途上的局限，便断定其毫无价值；而庄子则独具慧眼，洞察到平常看似无用之物在关键时刻的救命作用。从更深的寓意来说，惠子看重的是物质效果，追求的是眼前的、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而庄子更加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效果，关注的是事物潜在的价值和长远的意义。这也正是“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的差异所在——前者更重视物质效果，追求立竿见影的回报；后者更注重精神效果，着眼于心灵的滋养和思维的拓展。

“无用之书”的精神滋养

笔者认为，物质诚可贵，精神价更高。毛泽东同志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如同黑暗中的明灯，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又似冬日里的暖阳，给予我们温暖的力量。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物质上的帮助或许能解一时之急，但最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重拾信心的，往往是精神的重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正是多读一些“无用”之书的意义所在。

“无用”之书，如文学、哲学、历史等领域的经典著作，虽然不能直接、“即刻”为读者带来物质上的收益，但它们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情感故事，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与美好，激发我们的同情心和想象力；哲学著作中的深刻思考、智慧箴言，能够引导我们反思人生、探索真理，培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历史书籍中的兴衰成败、经验教训，能够让我们以史为鉴，汲取智慧，更好地把握当下、展望未来。

例如，阅读《论语》，我们可以领略到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智慧和思想，学习到为人处世的道理和道德准则；阅读《哈姆雷特》，我们可以感受到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命运的无奈叹息，引发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阅读《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历史的波澜壮阔和众多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阅读地方政协优秀文史资料，我们能通过“亲历、亲见、亲闻”的鲜活史料，触摸地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感受社会的时代变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生动实践。这些“无用”之书，就像一位位无声的导师，默默地陪伴着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给予我们启示和指引。



萌

王茹摄